顧頡剛及其“疑古史學”新解
——試從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

王晴佳

提要： 自二十世紀初年始，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經歷了一場巨變。繼 1902 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號召“史界革命”之後，顧頡剛在 1920 年代發起的“古史辨”運動，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看法，實踐了梁氏所言之“革命”。本文從分析顧頡剛編輯《古史辨》和寫作自序開始，利用近年出版的顧頡剛日記和書信等一手材料，指出顧氏之發起有關中國古史真僞的討論，不但有諸種學理和思想上的淵源，也應注意他的家庭關係、幼年生活和求學經歷所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徵。本文則側重研究顧頡剛的口吃及其衍生出的心理、行爲特點，並希求對顧氏“疑古史學”的起源提出一個新的解釋。

關鍵詞： 顧頡剛　胡適　傅斯年　《古史辨》　口吃　心理　性格史學

DOI:10.16837/j.cnki.1002-0039.2017.04.011

1926 年 6 月 11 日，年僅三十三歲、從北大畢業未到六年的顧頡剛（1893—1980）編輯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集中收入了前幾年他與胡適、錢玄同及其他人討論古史真僞的信函。用編者晚年

的回憶來形容,他在其中表達的對中國上古歷史的看法,如"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等篇,"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① 而胡適(1891—1962)在當時的評價則是,這些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丁文江)先生們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因爲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② 顧頡剛的北大室友、當時在歐洲求學的傅斯年(1896—1950)和其他同學知道了他的古史觀點之後,也稱贊有加。用傅斯年的話來說,那就是"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③ 1929 年,美國漢學家恒慕義(Arthur Hummel)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題爲"中國史家對他們歷史的改造"的論文,更將"古史辨"的討論介紹到了海外。④ 的確,以中國史學在近代所經歷的大變革而言,梁啓超 1902 年在《新民叢報》上連載發表的《新史學》,發出了改造中國傳統史學的先聲,而顧頡剛在二十年之後發起的"古史辨"討論,則用實例證明了傳統史學所存在的諸種問題,並進一步提出和嘗試了解決的路徑和方法。而且,顧頡剛對古史真僞的懷疑和批評,不但牽涉了史學,還改變了中國人對自身歷史的態度。1971 年另一位美國漢學家勞倫斯·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顧頡剛的學術傳記——《顧頡剛和中國的新史學/歷史》。據筆者所

①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1 年,頁 17—18。

② 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見《古史辨》(一),頁 189。

③ 《傅斯年全集》(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年,頁 457—458。顧頡剛 1924 年給妻子殷履安的信中也提到,毛子水那時從歐洲給他來信,說他和傅斯年等北大同學對他治古史,稱贊有加,認爲他抓住了一個"中心問題"。見《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四),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427。

④ Arthur Hummel,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to Their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4: 4 (1929), pp.715-724.

知,這是所有出版的顧頡剛傳記中的第一部。而施耐德在傳主在世的時候便爲其寫傳,在中外學術界均不多見,足見顧頡剛作爲中國現代史家的重要地位。以民國學人的海外影響而言,顧頡剛的老師胡適堪稱是第一位。但西人寫作胡適的第一本傳記即賈祖麟(Jerome Grieder)所著《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出版於 1970 年,僅比施耐德所寫的傳記早一年,所以在近現代中國學人中,顧頡剛的國際影響亦首屈一指。①

在施耐德出版了有關顧頡剛的專著之後,中國學者也陸續出版了大量的傳記和論著。如 1986 年有劉起釪所著《顧頡剛先生學述》和 1987 年王汎森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等,②都是較有影響的早期著作。1990 年代之後,海峽兩岸的學者又陸續出版了有關顧頡剛及其學術的著作,其中顧頡剛的女兒顧潮和顧洪用力甚勤,爲我們了解顧頡剛的治學與爲人,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另外,美國華裔學者洪長泰於 1985 年出版的《到民間去: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俗文學》一書,儘管不是有關顧頡剛的史學論著,但卻涉及了顧頡剛學術的另一重要方面,那就是他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從事的民俗學研究。③ 1994 年李學勤結集出版了《走出疑古時代》一書,雖然沒有點名顧頡剛,但卻以近年許多

① 見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在上述西文的論著之外,1940 年東京大學的教授平岡武夫也將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譯成了日文出版。有關顧頡剛"疑古史學"的國際影響,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有詳細的討論,頁 287—329。有關胡適的國際影響,見王晴佳《胡適的"中國文化大使"之路:以 1917—1937 年〈紐約時報〉的報導爲中心》,《南國學術》,2(2017),頁 239—255。

②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事業公司,1987 年。

③ 參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顧潮、顧洪《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 年。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的考古發現來指出疑古史學的局限。李學勤寫道“疑古思潮在思想上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但因懷疑過度,難免造成古史的空白。”[①]儘管對古史的看法不同,但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的出版及其近年陸續開展的工作,也從側面反映了民國初年顧頡剛古史研究的深遠影響。

從現在的標準來重讀顧頡剛所編的《古史辨》,也許不少人會有所驚訝和困惑,因爲這部在中國史學史上堪稱畫時代的論集,並沒有采用嚴格的學術論文形式,而是由許多來往信函所組成。當然,在這些通信中,顧頡剛及其支持者(特別是錢玄同)也擺出了許多實例來說明、證明其觀點。但從寫作方式來看,與現代學術論文的要求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更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爲《古史辨》第一册寫了一篇六萬餘字的“自序”,其篇幅占整本書的三分之一。如此做法,在中外學術界幾成一個特例。有必要一提的是,恒慕義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上面提到的論文之後,又在1931年將顧頡剛的長篇自序譯成了英文,以《一個中國史家的自傳》單獨出版。[②] 恒慕義的這一改動,應該說頗爲恰當,因爲顧頡剛在其自序中,詳細交代了自己的生平和學術道路,從篇幅和內容上都稱得上是一部自傳。如果說胡適於1933年出版《四十自述》,爲的是糾正“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的現象,[③]那麽他的弟子顧頡剛早他好多年便已將其付諸實踐了。

顧頡剛在臨終前,他又寫作了一篇《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的長文,再度巨細無遺、不厭其煩地交代了他的學術生涯。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古史辨》的時候,將其與他在

① 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4。

② Arthur Hummel,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iden: Brill, 1931)。

③ 胡適《四十自述》,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頁1。

1926 年的自序同時印出。顧頡剛這些自傳性的寫作,對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而從現有的論著來看,許多顧頡剛的研究者也的確大量參考了他的自述。2000 年,臺灣聯經出版公司整理出版了《顧頡剛日記》十二卷。其後的 2010—2012 年,中華書局又整理出版了《顧頡剛全集》,共有五十九卷、六十二册、二千五百多萬字,其中包括“古史論文集”十三册、“書信集”五册等,而其所留下的“讀書筆記”更有十七册之多。這些卷帙浩繁的第一手資料,爲顧頡剛研究者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材料。如余英時在讀了《顧頡剛日記》之後所寫的《未盡的才情》一書,已經爲我們簡略地闡發了顧頡剛爲人和治學等許多尚未被人知曉的方面。①

顧頡剛先生留存的上述這些豐富浩繁的第一手史料,不但是筆者研究的基礎,而且還是本文寫作的誘因。換言之,本文的研究角度與以往的研究頗爲不同——筆者所關注並試圖分析的問題,正是顧頡剛爲什麽會如此筆耕不輟、留下大量通信、日記、筆記和自述、自序的原因(他之後所編輯的《古史辨》,也都附有長篇的自序)。舉例而言,如果顧頡剛編輯《古史辨》沒有采用我們熟知的論文寫作,而是發表了大量的通信,那麽除了表明顧頡剛的勤奮治學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什麽特别的原因?筆者的基本論點是,《古史辨》編纂形式的特點(長篇自序、通信交流代替論文寫作等),固然有時代的因素——諸如當時中國學術剛剛起步,許多人或許還不太熟悉論文寫作——但同時也需考察顧頡剛本人的治學特點和風格,並可以從心理和性格的角度來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和特點。

---

①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年。余先生對顧的日記作了詳細的閱讀,發現了許多不爲前人所知的細節,但也許他受制於篇幅,對許多方面的討論並沒有詳細展開。

一　爲什麽寫如此長的《古史辨·自序》?

讓我們先從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入手。這篇長達六萬餘字的自序,由顧頡剛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寫就,其內容和風格或許可以用"直抒胸臆、酣暢淋漓"這八個字來形容。顧在寫了大約三萬字的時候,就在日記中記到,這是他"生平第一長文"。以後在晚年寫《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的時候又說,這篇自序"是我一生中寫得最長最暢的文章之一"。顯而易見,顧本人對寫這篇自序,頗費心思、也頗爲得意,寫完之後曾多次修改、校閱。① 爲什麽顧頡剛對寫自序如此用心和用力呢? 其實在這篇自序中,我們已經可以找到一些十分有用的線索。而他當時所記的日記,更能幫助我們從他的出生、早期教育和經歷等方面,檢討顧頡剛發起"古史辨"討論的個人心理和性格因素。

顧頡剛在《古史辨·自序》的開始,首先交代了自己在前幾年發表了討論古史的通信之後,遲遲沒有將之彙集整理的原因及今後的計畫。然後他筆鋒一轉,開始解釋自己爲什麽會不避衆嫌,挑起古史真僞的討論"我所以有這種主張之故,原是我的時勢、我的個性、我的境遇的湊合而來。我的大膽的破壞,在報紙上的發表固然是近數年的事,但伏流是與生命俱來的。想象與假設是一點一滴地積起來的。"②他的這些話,爲他在下面講述自己的生平作了鋪墊。但同時也讓我們看到,顧頡剛自己也希望讀者和將來的研

① 《顧頡剛日記》(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年,頁 724,729—732 及上引《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

②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 4。

究者看到學者的品性、人格與學術興趣和追求之間的緊密關係。

顧頡剛的生平回憶從他的童年開始。他提到自己出生的時候,家裏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小孩的哭聲了,所以家長們(父母加上祖父母)都對他寄予很高的期望,因爲顧家乃書香門第,祖上便有功名。據說康熙皇帝下江南,曾稱顧氏家族爲"江南第一讀書人家"。① 而他們爲實現這一期望,便對顧嚴格管教,導致他遊戲的時間很少,因此手足不靈、言語鈍拙。顧家有不少藏書,因此顧頡剛幼承庭訓,得到曾是秀才的祖父及母親和祖母的教誨。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即開始瀏覽父親從上海等地買回來的一些世界史的讀物,同時也在私塾裏讀了不少傳統的經典。八歲開始他有了一個新的私塾老師,由他祖父請來幫他理解《詩經》和《禮記》等一些較難的經典。該私塾老師管教甚嚴,讓顧頡剛大聲朗讀這些含有不少生僻字眼的典籍。顧回憶道:

> 讀到《大雅》和《頌》的時,句子更難念了,意義愈不能懂得了。我想不出我爲什麽要讀它,讀書的興味實在一點也沒有了。這位老先生對付學生本來已很嚴厲,因爲我的祖父是他的朋友,所以對我尤爲嚴厲。我越怕讀,他越要逼着我讀。我念不出時,他把戒尺在桌上亂碰;背不出時,戒尺便在我的頭上亂打。在這種的威嚇和迫擊之下,長使我戰慄恐怖,結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

顧頡剛在忍受了這些身心的折磨之後,卻最終也沒有得到那位老師的首肯。有次他講出了一篇古文的大意,那位老師對他祖父說:"這個小孩子記性雖不好,悟性卻好。"②這一評語顯然不確,因爲顧頡剛從小讀書,而中文的最初學習,必須死記硬背方塊字,不像

① 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

② 同上,頁 7—8。

拼音文字那樣容易上手,所以他的記性應該相當好。在顧頡剛百年誕辰紀念會的時候,他以前的北大學生、也是顧一生眷戀的譚惕吾(原名譚慕愚、字健常,1902—1997)特意趕來參加了會議,她在發言中特別强調了顧頡剛先生"記憶力極好"。① 從顧頡剛晚年寫的《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文中,我們也可清晰地看出這位耄耋老人,對過往的事情仍有良好的記憶。

不過,在孩提的時代聽到老師對自己有"記性不好"的評價,顯然會對顧頡剛產生重大的影響。如上所述,《顧頡剛全集》中,讀書筆記的部分占據最多,共有十七卷。在《顧頡剛日記》中,他也多次提及自己讀他人著作的時候,常常做詳細的筆記。比如在他八十一歲高齡的時候,他的學生童書業(1908—1968)已經去世,其家人寄來遺稿《春秋左傳史劄記》。顧頡剛根據自己多年養成的讀書習慣,想加批注,但稿紙過狹,所以特意請人將其謄寫一遍,以便他"加墨"。同年,他雖然老眼昏花,寫字不便,但還是做了《甲寅雜記》和《讀左傳隨筆》。② 換言之,顧頡剛一生都希求勤能補拙,以多動手、多記筆記來補償自己腦力的"不足"。

顧頡剛筆頭勤快、筆耕不輟的另一個原因,應該與他從小患有的口吃也有不小的關係。他在口頭表達上有障礙,不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因此通過書寫來宣洩情感,於是他在寫了長篇的序言之後,覺得是自己人生的一大快事。常言道:不吐不快,對於顧頡剛來說也許是頗爲貼切的形容,只不過他是在紙上"吐",下筆不休,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喋喋不休。上面已經提到,《顧頡剛全集》中有書信集五卷,其中收入顧與家人和朋友之間的大量通信,而其中又以他與後兩任妻子殷履安和張靜秋爲最多。顧與她們結

① 譚惕吾的發言可見李向東《丁玲、顧頡剛眼中的譚惕吾》,《書城》,3(2010),頁67。
② 《顧頡剛年譜》,頁391。

婚之後往往每天一信,而且長篇累牘,巨細無遺。1932 年顧頡剛在杭州照料父親數月,他給殷履安寫道:

> 我這次動身時,帶了信箋約百張。來杭帶的信箋用畢,陸續購用,每次買二百張,到現在已是第三次了。以每紙平均二百字計算,我已寫了十萬字了。其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寫給你的。我自己覺得,說話的本領太低而寫信的本領太大。你道是嗎?①

顧頡剛的這一自我評價,也能讓我們對《古史辨》爲何多取通信的形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俗話說,真理越辯越明,而顧頡剛與人爭辯,辨明古史之真僞,則訴諸筆墨。

口吃頗爲常見,世界上有許多種語言,但不管使用什麽語言,都有口吃患者存在。比如古希臘的著名演說家德摩斯梯尼,據說就患有口吃。他爲了克服口吃,曾含小石子在嘴裏,然後迎着大風和波濤講話。現代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據說年輕的時候也是通過類似的方法克服了口吃。但許多口吃患者往往終生未愈,不過並沒有影響他們成爲政治家、演說家、科學家、教授、演員等,現代比較著名的例子有牛頓、達爾文、邱吉爾、瑪麗蓮・夢露和甫卸任的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等。中國歷史上已知的例子則有韓非子、鄧艾及近代的柳亞子等等。在二十世紀以前,學界對口吃沒有什麽科學研究。但弗洛伊德(Sigmund Frend,1856—1939)曾經用精神分析的手段,對他的一位女性口吃患者做過一些初步的研究,指出了口吃的形成及其對性格的影響。弗洛伊德的研究雖然稱不上系統,但對後人頗有啓發。二次大戰之後,對口吃的研究日益增多,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這些科學研究,讓我們對口吃患者及其心理、行爲特徵,形成了新的認識。比如現有的研究已經指出,口吃者雖然說話不流利,但這對他們的智力發展沒有負面的影響;口吃

---

① 《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578—579。

者的智力水準不但與不口吃者不相上下,甚至還高於一般人。世界歷史上出現了諸多口吃的名人和成功人士,就是一個說明。①

現代的研究還發現,兒童在五至十歲的時候,是口吃現象的多發期,不分男女。但到了十二歲之後,許多女孩都會自然而然地克服了口吃,而相應的比例在男孩中相對要少得多。所以從男女的比例而言,男性口吃患者要比女性口吃患者多大約二十倍。而且口吃患者一般不會痊癒,只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逐步養成了克服口吃的方法,讓其他人不容易發覺而已。② 比如二戰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是現代世界著名的演說家。他戰時發表的不少演說,有力地鼓舞了英國人和整個同盟國的士氣,爲最後戰勝希特勒德國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據邱吉爾的私人秘書回憶,這位叱吒風雲、"其語言能展翅飛翔"的政治家,其實一生都爲口吃所擾。他演講之成功,背後傾注的是他的辛勤準備及在英語上的高深造詣。③

如果口吃往往終生不愈是科學研究的一大發現,那麼科學家對口吃的形成也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口吃患者常常不是由一件事情所造成的。因此顧頡剛回憶自己口吃,歸咎於私塾老師的嚴苛,並不一定是惟一的原因。查閱他的日記發現,他的母親對他管教也十分嚴厲。他一次尿牀之後,就不再與他同睡;顧頡剛之後與其

---

① Malcolm Fraser, *Self-Therapy for the Stutterer* (Memphis: Stuttering Foundation of America, 2007, 10th edition), p.17.2013 年有人對口吃的兒童作了研究,發現他們智力高於平均水準, http://guardianlv.com/2013/08/stuttering-children-more-intelligent-according-to-new-study-video/。蔣寅《金陵生小言》提到"慧心者多口吃",並舉近代王國維、馮友蘭等多人爲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

② Elaine Kelman & Alison Whyte, *Understanding Stammering or Stuttering: A Guide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2012), pp.21-40.

③ Phyllis Moir, *I Was Winston Churchill's Private Secretary* (New York: Wilfred Funk, Inc. 1941), pp.147-161.

嗣祖母一起睡到他十七歲結婚。① 根據我們所熟知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他母子關係如此緊張,顯然會對他以後的行爲和性格造成特殊的影響。而就在那位老師要求他朗讀深奧古文的那年,他的母親周氏則因病去世了。因此如果顧頡剛的口吃是因爲受到了某個事件的刺激,那麼除了私塾老師的威嚇,他小小年紀失去親生母親也須考慮。

而一個更可信的說法是,口吃患者與家長的高度期望有很大關係。小孩在牙牙學語的時候,往往會有詞不達意和口吃現象的出現。如果家長對之特別注意,比如好意地要他(她)慢慢講、重複一遍等等,希望他(她)口齒伶俐、表達清晰等等,其實反而會造成該孩子的終生口吃。科學研究已經證明,口吃患者不是一種生理疾病,而是一種心理現象,因爲許多口吃患者在獨處和放鬆的時候,講話並無問題,只是在與人(特別是生人)談話的時候,纔會出現口吃。美國口吃研究專家奧利弗・布勞德斯坦(Oliver Bloodstein)提出了一個爲人所認可的理論,那就是口吃患者講話的時候,有一種"預期掙扎的反應"(anticipatory struggle reaction),意思是口吃者在還沒講某句話、某個字的時候,心理上已經有所掙扎,感覺自己會口吃,而結果往往就是真的口吃了。而這一"預期掙扎"心理的形成,與他(她)幼年時代他人的惡意嘲笑、訓斥和善意的提示、幫助等均有關係,讓他(她)預知自己講話有困難。而普通人有時也會口吃,但因爲沒有這種心理障礙,所以下次講的時候並不會自我困擾,與口吃患者的心態十分不同。②

---

① 《顧頡剛日記》(三)記道他與他的姑母回憶自己的兒時,她們說他的親身母親有潔癖,如果他尿牀則必打他,而他生身祖母喜歡他,一定會過來勸阻,但他的母親"不受勸,則關閉房門而打",可見他母親對他之嚴厲管教,幾乎不近人情。頁 510。

② 布勞德斯坦的理論在許多口吃研究的論著中被反覆引用,見 Oliver Bloodstein, "Stuttering As An Anticipatory Struggle Reaction," *Stuttering: A Symposium*, (轉下頁)

以顧頡剛而言,他出生之後一直承擔着親人們的期望,包括他失去母愛後一直呵護、寵愛他的嗣祖母,也對他管教甚嚴。①這些高度期望的結果,便對幼小的顧頡剛造成很多心理壓力,希望自己能實現親人們的願望,出人頭地、榮宗耀祖。由此而言,他小時口吃的形成,也許與長輩們的嚴格管教和高度期望更有關係。他的私塾老師對他嚴苛,也反映了這一家族的期望。因此顧頡剛口吃的形成,與他幼時生長的家庭環境,總體相關。

顧頡剛在成年之後所記的日記中,幾乎沒有再用過"口吃"來形容自己,只是在與妻子殷履安的一次通信中,提到過一次。② 但他在書信和日記中,多次提到自己不願演講和上課,反映出口吃者常有的怕出醜心理。如在 1924 年他與北大女生譚惕吾等人剛認識的時候,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 上星期六在公園,陶女士提議,要我教她們國文。予以不會講書,卻之。嗣想明年暑假如替她們編一種"國故的常識"講義,可以出版。因與介泉(潘家洵,他的老鄉和同事)言之。介泉必欲予演講,今日與譚(惕吾)、彭諸女士言及,她們指定廿九要我講。夜中自度,遂不成眠。此事爲我生平第一次,不知要否出醜耳。③

(接上頁) ed. Jon Eise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8), pp. 1–70 和 Ann Packman & Joseph S. Attanasio, *Theoretical Issues in Stuttering* (Hove &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135–137.

① 顧頡剛回憶其嗣祖母,說她管教很嚴,不讓他吃零食,也不准他因下雨就不上學。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8。

② 《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453。

③ 《顧頡剛日記》(一),頁 499。最後顧頡剛決定還是作了演講,並在之後的日記中記道"此予生平第一次演講,極可紀念。"但他的自我評價不高,"今日予尚說得出,但方音太多,恐他們不懂",頁 502。他所謂的"說得出",就是沒有太怎麼口吃。他在給妻子殷履安的信中,對這次演講有更多的描繪"我本來怕爲口吃之 (轉下頁)

這段自述，明顯地反映出顧頡剛心理的掙扎。雖然他早就有失眠癥，但如他的日記所示，他失眠的造成往往有一個原因。這次他爲譚惕吾等人所邀演講，讓他夜不成寐，因爲他已經對譚惕吾頗有好感，也許對此事有點躍躍欲試，但又生怕出醜，這就是布勞德斯坦所論及的口吃者有“預期掙扎”心理的一種表現。

顧頡剛從北大畢業之後，深知自己說話不流利，因此雖然胡適、羅家倫希望他去北大預科任教，他卻選擇在北大圖書館擔任薪資微薄的編目員。不過這一職位也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了老師胡適的一個研究助手，這一關係對他之後的古史研究顯然深有影響。以後北大國學門成立，他成爲其中的一位研究助教。後來他因爲自己深愛的嗣祖母病重，他從北京到蘇州探視不便，就接受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職位，使他得以在上海、蘇州近距離往返，直到祖母過世。之後他又回到北大國學門工作。所以在他“古史辨”的討論成名以前，並沒有擔任過教學工作。一個例外是他在 1921 年十月爲北大預科上作文課，但他三週後就辭了，理由是不想改作文。① 但也許他的口吃是更大的原因，讓他有意逃避上講臺。不過顧頡剛推辭教書自己給出的理由則往往是，自己是蘇州人，不會講官話。這或許不錯，因爲他剛從北大畢業的時候，與同鄉潘家洵、吴輯熙交往似乎最多。但他已在北京生活了多年，又喜歡聽京劇和河北梆子，還與胡適、傅斯年、羅家倫等師友過從甚密，所以他用北方官話交流，早已不是問題了。他自己在 1924 年給殷履安的信中就已經記道，北方人都能

（接上頁）故要說不出話，但那天卻還說得出，居然連續講了一點多鐘，沒有間斷。所自己甚不足的，乃是不會說北方話，蘇州方音太重，恐怕大家聽了不了解。”《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453。

① 《顧頡剛年譜》，頁 65。

聽得懂他的話。①

1920 年代初期開始的“古史辨”的討論,讓顧頡剛聲譽鵲起,各大學邀約不斷,而且一下就聘他爲教授。比如他在出版《古史辨》第一册之後一個月不到,便收到廈門大學的聘書,讓他出任研究所導師、國學系教授,以後又改爲史學研究教授。而他的同鄉、同事潘家洵也因爲北京政局的動蕩和北大的欠薪而與他一同南下,只得到了廈大講師的職位,引起了潘的不滿。據顧頡剛自己說,他與魯迅的矛盾,也與他的一舉成名有關,讓他這位昔日的學生,與聲名遠揚的老師魯迅平起平坐,使後者不快。② 不過顧頡剛雖然身爲教授,卻還是不想上課。他在 1926 年 8 月 25 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在國文系中本須授課,今乃改爲‘研究教授’,不必上課,甚快。”不過這一快事沒有持續多久。他在同年 9 月 10 日的日記記到‘校中仍要我教書。……予此次任課,以買書爲要脅,必有書然後開始授課。”③由此可見他不願講課的心理。

顧頡剛名聲日隆,請他演講的場合、機會很多,他有時也無法回避。比如在廈大的時候,他被邀請在孔子誕辰的時候做一演講,聽衆達三、四百人。他說自己能在這麽多人面前演講一小時,‘這是想不到的事情”。④ 可見在公共場合講話,對顧頡剛仍是一個挑戰。在傅斯年從歐洲回國之後,力邀顧頡剛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顧決定離開廈門大學到中山大學,固然是看在老同學的面上,但他

① 《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451。他在該信中還提到,其中的一位北方人徐旭生對他說,你講的比馮友蘭好。馮友蘭亦患口吃,徐是否在說顧頡剛口吃沒有馮嚴重?有關馮友蘭的口吃及其演講,其同事和學生有所評價,見張天行《馮友蘭把口吃轉化爲長處》,《新天地》,6(2015),頁 26—27。

② 《顧頡剛日記》(一),頁 782,784。另見《顧頡剛年譜》,頁 129。

③ 《顧頡剛日記》(一),頁 784,790。

④ 《顧頡剛日記》(一),頁 803。

不想上課是一個重要原因。因爲傅最初答應他到中大可以不上課。顧到了中大之後,改爲一週只上七小時課,希望他“用全力於研究所而以餘力及文科者”。的確,傅斯年在中大成立了語言歷史研究所,但校務繁忙,顧頡剛則是該所的主將,如編輯《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通訊》等。但之後這一安排有了大變卦,顧頡剛對容庚的信上這樣說“一星期要上十七八小時了,連星期日也上了課了。”①傅斯年的變化,讓顧頡剛非常不滿,於是心生去意。而容庚在他去中大之前就邀他去燕京大學,因此顧頡剛便與容討論應聘燕大,而他討價還價的關鍵,還是希望能不上課。但容後來告知也要上課,於是就有點失望。他的日記這樣記錄“希白(容庚)來信,謂燕京大學設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員仍須兼大學本科課,並須辦事,聞此使我心冷。”②於是他一方面與容庚繼續商量,另一方面又打算應蔡元培之邀,與傅斯年一同籌備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對容的解釋是,如果成爲中研院的研究員,那麼“固然我以前說的‘不辦事’做不到,但‘不教書’總算可以做到了”。③由此可見顧頡剛之於教書,可謂避之惟恐不及。其中自然有他一心專注研究的原因,但他因口吃而不想在公衆面前講話,想來亦是其中另一原因。不過事情後來的發展並不如顧頡剛所願:他與傅斯年矛盾的激化,使他無法與之共建歷史語言研究所。而他對傅斯年的“反擊”,就是在離開廣州、回到北京之後,不回母校北大任教,而是選擇去了傅斯年一直不主張他去的燕京大學任教。幾年後他去母校北大兼課,也不取薪水。④但無論如何,顧頡剛雖然百

① 《顧頡剛書信集》(二),頁185,182。

② 《顧頡剛日記》(二),頁148。

③ 《顧頡剛書信集》(二),頁182—183。

④ 傅斯年曾有信給他,說顧在燕京教書是在“爲亡國做準備”,顧頡剛頗不以爲然。《顧頡剛日記》(二),頁536。傅斯年一直希望顧頡剛若在北京,應該在 (轉下頁)

般不情願,最終還是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教授。

不過即使上課,顧頡剛也有自己的特點,那就是以筆代口,盡量自己不講課。這以後成了他獨特的教學方法,爲他的學生所牢記並贊賞。歸納他的學生如楊向奎、劉起釪、王樹民所言,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編寫和印發許多講義給學生,讓學生自己閱讀並提出問題討論。二是讓學生做大量讀書筆記,然後在課堂上交流、討論。三是發給學生練習題,讓他們就個人的興趣選擇回答,也就是進行專題的研究。顧頡剛特別會因材施教、提拔學生。一些學生的作業寫得不錯,他就爲他們仔細修改,然後推薦到刊物上發表,使他們得到很多鼓勵,並由此走上了學術道路。① 由於口才不好,書生氣十足,顧頡剛一生沒有擔任過什麽重要的學術職務,但他的熱心、慷慨、不拘一格和平易近人,使他周圍聚集起一批莘莘學子。他在這方面的成功也讓他的老同學、在民國學界稱霸的傅斯年頗爲嫉妒,多次當面揶揄他。②

二 "大器晚成"——顧頡剛的真情抑或矯情?

以上的敍述,簡單交代了顧頡剛作爲一個口吃者的基本行爲特徵。這些描述爲我們深入理解顧頡剛發起"古史辨"討論的前因後果及之後的所作所爲,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從常人的

(接上頁)母校北大授課,顧卻顯得猶豫。他後來在北大授課不取薪水,也有可能是表達自己對傅斯年霸氣的一種不滿。顧頡剛在燕京大學,每週上課三小時,這對他顯然有吸引力。見《顧頡剛書信集》(二),頁350。

① 參見王學典、孫延傑《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頁70—82。

② 《顧頡剛日記》(二),頁561,659;(三),頁620;(四),頁217。

眼光來看，口吃患者似乎並不怎麽與衆不同，就是說話有些困難而已。但其實現有的研究已經發現，口吃者由於幾乎每時每刻都會爲自己口吃而困擾、羞愧，甚至憤懣、自責，逐漸形成了一種與衆不同的心理特徵。當然，曾與顧頡剛熟悉並密切交往的人士在世的已經很少，我們不能真正知道顧頡剛口吃的程度。而且一般口吃患者隨着年齡的增長，會逐漸發展出比較好的能力，控制自己的口吃，所以曾與老年顧頡剛交往過的人士，也許還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青年和中年時代顧頡剛的行爲表現。但分析顧頡剛的《古史辨・自序》和他的相關日記及書信，則能讓我們一窺顧頡剛的心境和性格，對他的疑古史學有不同的體認。

如上所述，口吃患者中有不少人從事了需要大量講話的職業（演員、演說家等），這本身就體現了口吃患者的一種重要的心理特徵，那就是他們性格的倔强和執拗，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和決心。如上所述，顧頡剛表面上看似乎不具備這樣的性格，至少在青年和中年的時候，竭力避免公開講演甚至上課。但如果看他的《古史辨・自序》和他的日記與書信，我們可以發現他的反叛和倔强由來有自，自小便開始並終生都沒有改變，對此我們將在下文再述。

除此之外，顧頡剛的日記還披露了許多有關他治學上、性格上、生活上的許多特點，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分析。比如顧頡剛三十歲出頭便一舉成名，由大膽質疑夏王朝的歷史性而名聞全國。1930 年代初他應邀去各地講學，被當地學者譽爲“史學泰斗”、“史學明星”和“打破僞史建設真史”的“史學大家”等等。而幾乎與此同時，由於恒慕義等人的介紹，他對中國古史的質疑也爲海外學界所知曉。對此顧頡剛自己十分清楚，認爲自己成名甚早。譬如他 1932 年便在私底下對妻子殷履安寫信形容他的名氣 “要說一句

滿話,也可說是‘世界聞名’。”①在這樣的盛名底下,顧頡剛的有些行爲和做法,便會引起別人的看法甚至誤解。比如上面已經提到,顧頡剛離開中山大學去燕京大學,討價還價,希望只從事自己的研究而不教書、不辦事(即不擔任行政職務)。這種要求在常人看來,有可能會覺得不太合理:應聘大學教授,教書自然是天職,而你卻老大不情願,是否覺得自己研究特別出色?他和北大師友、原先便心高氣傲的魯迅、傅斯年等人關係相處不好,也與他成名之後的境遇和他自己的處事方式,頗有關聯。甚至,他的老師胡適後來也批評顧頡剛有點驕傲或顯出傲氣。②

但現在看來,即使如他的恩師胡適,也有點冤枉了顧頡剛。因爲胡適自己口才出衆,不能體諒顧頡剛口吃的苦惱。其實,遠在顧頡剛成名之前,他剛從北大畢業、希求謀職的時候,他就向關照他的胡適表示,希望“一不教書,二不辦事,也不責望我到校”。③顧那時出任圖書館的編目員和國學門的助教,而拒絕任教北大預科,都是例證。在聽到胡適說他驕傲之後,顧頡剛這樣寫道:

>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外和而內傲的人,我決不能向人屈服,我有獨立自由的精神,願用十分的努力作獨立自由的發展,我決不想占人一分光,決不想不勞而獲,這便是傲的原因。傲和驕不同,驕是自己滿足,看不起人家;傲是仗着自己的力量而工作,不依傍人家,不在痛苦時向人家乞憐。④

顧頡剛是否驕傲自大,我們將在下面再論。但他對“驕”和“傲”不

---

① 《顧頡剛書信集》(四),頁489,502—503,599。顧在日記中記載,那時法國漢學家孟浩然(鐸爾蒙 André d'Hormon,1881-1965)曾在1932年8月數次造訪顧頡剛,並聲稱讀了顧的所有論著,可見顧名聲在外。《顧頡剛日記》(二),頁677—678。

② 《顧頡剛書信集》(五),頁269。

③ 《顧頡剛書信集》(一),頁297。

④ 《顧頡剛書信集》(五),頁269。

同的分析,卻有些道理。而從他一生的學術追求來看,他的確對自己的成就從不滿足,反而不懈努力。換言之,顧頡剛本人雖然有時也承認自己爲聲名所累,但在許多私下的場合卻認爲自己還不夠成功,乃至非常希望自己能大器晚成。他剛成名的時候,曾讓族叔顧廷龍書"晚成堂"的匾額,挂在自己的書房裏。他在前引 1945 年 4 月 19 日的日記中要求自己 "以不變的心應付一個對象。不可躁急,必須慢慢的來。不要貪多,勿誇勇敢,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何況你已在五十以外。你如果達到'晚成'的大願,必須痛改你廿五年來的習慣。"一個已經五十開外、在世人眼裏已經功成名就的顧頡剛,自己卻仍然期待做出更大的成就。幾年之後國民黨的統治走向潰敗,顧頡剛得知北京的一些史學家在 1949 年 7 月成立了新史學研究會,自己不在其內,有點氣餒,認爲自己受到了"新貴"的排擠。然後他在日記中這樣寫 "予爲自己想,從此脱離社會活動,埋頭讀書,庶幾有晚成之望。"1950 年底他又制定了自己研究、出版規畫,取名爲《晚成堂全集》。① 由此可見,顧頡剛認爲自己早年成就不大,並非謙虚和矯情,而是一種真實心情的流露。那麽他對自己的評價,爲什麽如此迥異於一般人呢?

還有,我們隨便翻閱《顧頡剛日記》便能發現,他在其中幾乎每天都會提到自己的身體狀況,如失眠、神經衰弱、便秘、心臟不適和高血壓。從常人的立場來看,顧頡剛出名很早,應該知道自己的日記將來會成爲後人研究的對象,那麽他爲什麽仍然津津樂道這些屬於個人隱私的事情呢?從他的這些頻繁的記載來看,似乎他身體狀況非常不好。但其實他的日記也記錄了幾次身體檢查,醫生的結論是他身體相當不錯。如 1936 年他四十三歲的時候 "今日驗身體,醫謂予心肺皆好,體重 146 磅,亦好。小便中絕無疾病。

① 《顧頡剛日記》(二),頁 664;(五),頁 402;(六),頁 484—485。

惟問彼血壓高若干,則不肯言,度必甚高也。”顧頡剛的確有點血壓高,但並不太嚴重,常常上壓高一些,到 150 甚至 160,而下壓則在 80—90 之間。① 以他中年的年紀,只要服藥,應該沒有大礙。而且他飯量一向很大,1949 年,他五十六歲的時候,仍然可以每頓吃三碗飯,或兩饅頭一碗飯。② 曾有一位作家寫了題爲“頡剛大肚”的特寫,在報上刊出,稱“他的身體好,事業欲極强”。③ 在他的同輩、同學中,顧頡剛壽命最長,活到了八十七歲,他的同學羅家倫比他小四歲,於 1969 年去世,得壽七十二。而比他小三歲的傅斯年,在 1950 年便遽然離世,僅僅活了五十四歲。所以顧頡剛的身體應該並沒有像他記錄、描述的那麽差。

當然,顧頡剛確實爲失眠、神經衰弱所困擾。④ 但從他的日記來看,他的失眠常常是因爲作文太久、用腦過多,或者與人談話、神經興奮,或者喝茶之後,造成難以入睡等等。這些其實都是造成失眠的常識,只要稍加注意便可以預防的。顧頡剛也常常提到自己的便秘,這固然也許與他的體質有關,但他也提到自己平時不喜歡吃青菜。⑤ 加上他長期伏案工作,運動相對少,也容易產生便秘。顧頡剛喜歡旅行,而在旅行期間,也許是舟車勞頓,加上走動增多,他便不再爲失眠、便秘所困擾。⑥ 總之,顧頡剛對自己的身體,似乎有太多負面的評價,與實際情況有所差異。如他幾次在日記中寫道:他在學問上企圖心很大,但“我的野心與我的身體背道而

① 《顧頡剛日記》(三),頁 534;(四),頁 585;(六),頁 697。
② 《顧頡剛日記》(六),頁 401。
③ 萬柳“作家側寫:頡剛大肚”,收入《顧頡剛日記》(五),頁 710。
④ 參見王文基《知行未必合一:顧頡剛與神經衰弱的自我管理》,中研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衛生與醫療》,臺北,中研院,頁 65—99。
⑤ 《顧頡剛日記》(二)記到 “予向不愛吃青菜,今日卻飽啖之。”頁 144。
⑥ 《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500。

馳,互相破壞,真無法”。他三十多歲就出現了白髮,也許與他用腦過度有關,但現代醫學可能更傾向認爲是遺傳的因素。不過顧頡剛則對此特別憂心忡忡: 1931 年他的妻子殷履安“爲他梳髮,嘆曰: ‘白髮愈多了,幾成斑白了!’聞此憮然”。而顧頡剛得出的結論是“予在此種身體之下究有成功之望否?”其實他在那時已經全國聞名,各個學校爭相聘請,但他自己顯然不認爲很成功,而且還覺得這是因爲身體的拖累。他的日記中曾多次對自己的“少白頭”,發出種種感嘆,認爲自己年華老去。①

更有趣的是,顧頡剛强調自己外冷內熱的“二重人格”,也即內心活動和外部表現以及生活上的笨拙和學問上的執着之間的明顯差異。② 他喜歡用各地區人的差異作比喻,如在 1931 年的日記中寫道‘我生了湖南人的感情,卻具了江蘇人的理智。我和廣東人同其魄力,卻又與江蘇人同其身體。這應當怎麽辦? 這應當怎麽辦?”他這段話的前句是描述自己對譚惕吾的愛慕及他們在情感上的默契,因爲譚是湖南人,而他則是江蘇人,所以不敢明確表達自己的感情。但他的後句則指自己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 野心像廣東人那樣博大,身體卻如江蘇人那麽羸弱。三年後他又重複了上述的比喻,並說自己有“江蘇人的心智”,但因爲“江蘇人的身體”,所以事業發展有所限制。③ 上述這些比喻是否恰當,自然另當別論,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他樂意强調自己的身心分離。在《古史辨・自序》中,他也有類似的表述‘許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爲我是一個沒有嗜欲的人,每每戲以‘道學家’相呼。但我自己認識自己,我是一個多欲的人,而且是一個敢於縱欲的人。”④這裏的“敢於縱

① 《顧頡剛日記》(二),頁 396,427,508。
② 《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 82。
③ 《顧頡剛日記》(二),頁 513;(三),頁 218。
④ 《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 98。

欲",可以指他之追求生活上的享樂,如曾迷戀聽戲、買書不惜代價等,但如他給北大同學俞平伯的信中所言,"縱欲"還指他在"求知"和"事業"上的不懈追求、高度期望和永不滿足。①

再次,顧頡剛的爲人處世也有特點。上面已經提到,他對後輩平易近人、熱誠推薦、慷慨提拔,甚至讓他們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論著。比如 1947 年出版的《當代中國史學》一書,就基本由他的學生童書業、方詩銘寫就。② 但顧頡剛與他的同輩、同學,卻常常無法處理好關係。他與傅斯年的關係,便是一個顯例。從《顧頡剛日記》所反映,他在廈門大學與魯迅產生了矛盾,正好傅斯年回國擔任了中山大學的教職,邀請他這位老同學共事。他欣然前往,但時隔不久,他就與傅大吵、鬧翻了。顧的解釋是:傅斯年以家長作風壓他,"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壓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③ 這是他在 1973 年的回憶,而所用"臻於破滅"頗爲恰當,因爲在他離開中山大學之後,與傅斯年仍然多有交往,直到 1948 年傅氏離開大陸。從傅斯年那方來看,他顯然很看重顧頡剛的學問,雖然兩人沒有共同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但在該所成立之後,傅邀請顧擔任研究員之職,也一直希望顧氏離開燕京大學,到北大擔任全職。但《顧頡剛日記》中則對傅多有微言,幾次提到與傅"絕交",受不了傅對他的評價。同樣,顧頡剛對自己推薦、提拔的錢穆,也在日記中表達出種種批評。而他對羅常培、羅庸,則幾乎可以用"恨之入骨"來形容,認爲他們姦佞、狡猾、品格低下。④ 後人現在很難對上述這些人及其他們與顧頡剛的關係作出公正的評價,因爲我們只有顧頡剛的一面之詞。但他的日記也反

① 《顧頡剛書信集》(二),頁 83。
② 《顧頡剛日記》(六),頁 121。
③ 《顧頡剛日記》(二),頁 160。
④ 《顧頡剛日記》(二),頁 222,281;(四),頁 206,224,271,743—744。

映出,顧氏對同輩學人所作的負面評價,有的是他親身經歷(比如潘家洵和傅斯年),但也有的是道聽塗説,由別人轉述的而產生的,而他則聽信了別人的閑話,對昔年的老友發出種種批評。這點在表面上看,似乎讓人覺得顧頡剛輕信他人,但其實恰恰反映出他性格多疑、爭强好勝的一面,使得他願意相信別人對這些朋友的批評。

其實顧頡剛爭强好勝的性格不但影響了他與同學、同輩的友情,而且也在他對老師的態度上有所反映。顧頡剛與胡適的關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作爲胡適的學生、畢業之後又成爲胡的研究助理,顧頡剛對胡適十分崇敬。他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指出胡適在北大開設的“中國哲學史”課程,讓他更有“上古史靠不住”的信念了。① 在信奉胡適的觀點之外,顧氏更佩服胡適的聰明。1919 年他的日記寫道 “下午讀胡適之先生之《周秦諸子進化論》,我佩服極了。”兩年後他給殷履安的信中也説,對胡適羡慕,爲自己慚愧,“想想他只大得我三歲,爲什麽我不能及他?”然後在差不多三十年之後的 1947 年,他因病得閑,又花了六天時間重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覺其澈骨聰明,依然追攀不上。想不到古代哲學材料,二千年來未能建一系統者,乃貫穿於一二十七、八歲之青年,非天才乎!”②顧頡剛發出這樣的感嘆,是因爲在他發起了“古史辨”的討論之後,常有人説他的成就超過了胡適。他在 1929 年、1930 年的日記中對此都有記載,提到别人認爲他“重開吴派”,成就超過了胡適,成爲國學三派的領袖之一: 章太炎、王國維和顧頡剛。顧認爲這些評語是“捧殺”他,只會讓他遭人嫉妒。③ 但結

① 《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 36。

② 《顧頡剛日記》(一),頁 73;(六),頁 138;《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329。

③ 《顧頡剛日記》(二),頁 272—273,446。

合看他對胡適的評價,顯然他也有與胡適爭勝的一面。余英時讀了《顧頡剛日記》之後,對顧與胡的關係作了剖析,認爲顧在晚年否認胡適對他疑古思想的影響,並不完全是出於政治運動的壓力,而是有他的真實想法在內。① 筆者同意余先生的看法,並想說顧爭强好勝的性格,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至於他說到自己遭人嫉妒,他的日記中對此記載很多,也在側面顯示出他性格多疑的一面。

概括以上,我們可以將顧頡剛的心理和性格歸納出三大特點:(1) 他有比較突出的二重人格,不但表現爲外冷內熱,而且還有外柔內剛,桀驁不馴、倔强叛逆的一面;(2) 如他自己所言,他"好大喜功",對自己有很高甚至太高的期望,從而對自己的成就永不滿足,並爲此目的努力培植自己的勢力;(3) 他特別爭强好勝,由此而對他人特別是同輩的成功人士,多有猜忌和懷疑,常常無法處理好關係,造成友情破裂等等。

三 顧頡剛的口吃與"德摩斯梯尼情結"

筆者認爲,上述顧頡剛的這些性格、心理特徵,如果參照現有對口吃者的研究,可以得出一個新的和比較有啓發性的解讀和分析。首先,在常人看了,口吃者似乎只是講話不流利、不善表達而已,但因爲講話、與人交流是人的最基本活動之一,這方面有障礙其實會對口吃者的心理和性格造成重大的影響。我們上面已經提到,口吃患者的最大挑戰是"預期掙扎的反應",也即患者在幾乎每次開口的時候,都要經過一次心理的掙扎和搏鬥 "這次說話我

①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28 以降。

是否會口吃?""如果口吃,會不會讓人嗤笑?""要不要開口,或許就不說了,以免自取其辱?"這些種種的疑問和心理活動,在非口吃者身上不會出現,但口吃者則無可避免,必須時時面對,找出對應的方法。而麻煩的事實卻是,上述這些心理掙扎,恰恰造成了口吃,也就是一個口吃者在這些方面考慮越多,反而越會造成說話的困難——結巴、停頓、重複甚至說不出話等等。這就是"預期掙扎的反應"的理論所總結出的結論。因此不少研究已經指出,口吃者在熟人面前,往往表達要流利一些,因爲他知道對方已經知道他的口吃,所以說話的時候反而沒有什麽心理顧慮,加上口吃者其實並無說話的生理障礙,因此在表達上就會比陌生人面前和公衆場合要順暢得多。也有的研究指出,許多口吃者到了五十歲之後,口吃的癥狀會有明顯減輕、甚至消失,"因爲這個時候,他們對口吃不在乎了,談婚論嫁的時候早已成爲歷史,第三代也已有了;快要退休了,也沒有機會提升了,說話的連貫與否對他們也不重要了。持有這種心態,久而久之,口吃的問題也就消失了"。美國口吃協會的研究這樣總結"從心理方面而言,口吃大體上是由於口吃者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口吃所引起的。換言之,它是口吃者對自己開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玩笑。"一言以蔽之,"如果你覺得自己絕不能口吃,你就一定會口吃"。①

以顧頡剛而言,他在年青的時候爲口吃所困擾,顯示出比較典型的口吃者的心理特徵。他雖然在《古史辨・自序》中責怪小時的私塾老師造成自己的口吃,而之後在通信和日記中,則很少提及自己有口吃的障礙,這表示他在心理上竭力想避免口吃。不過他的日記還是間接披露了口吃給他帶來的不便、尷尬甚至難堪。譬

① 姚鑫山《口吃的心理治療》,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3 年,頁 14—15; Malcolm Fraser, *Self-Therapy for the Stutterer*, p.19、16。

如1930年12月16日他記道"清華史學會一定要邀我演講,而我既訥於口,且以南歸在即不能預備,只得隨便敷衍了半小時。"一般演講都會有一小時以上,而他講了半小時就草草收場,可能就是因爲情緒緊張、口吃嚴重而無法完場。翌年他到青島大學,推脱不過,作了一次講演,他在日記中記道"我畢竟不是一個能演講的人,今日費時雖多,但聽衆無甚興味。先走者甚多。我想,即以此爲我演講的末次吧!"不過演講可以拒絶,上課卻不能,所以他采取了服鎮靜藥的辦法。1932年他到北大上"中國通史"課,聽者有兩百餘人。"予性太急,深恐說得太快,故服Adalin以鎮服之"。Adalin是一種常用的鎮靜劑。1934年他在杭州與譚惕吾頻繁來往,感情有所發展。11月12日的日記寫道"健常近日以天氣潮濕,頗不舒服,夜中頻發熱,今日午飯只吃一碗,飯後作嘔欲吐,自提頸痧三道,思及身世,淚又盈睫。予甚欲慰之而苦於不能,只得早歸矣。"①他摯愛的譚惕吾在他面前流淚,並吐露了自己的身世,常人在相似的場合一定會對之表示安慰和撫惜,而他卻因爲口吃連話也說不出來,只能拋下她一個人悻悻然地回家了。對顧頡剛而言,這必然是一次難堪、苦痛的經歷。不過他到了五十歲之後似乎口吃明顯有所好轉。1946年他應邀在新夫人張靜秋的老家徐州作了兩次講演,時間都長達兩個小時。1948年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1894—1977)邀請顧頡剛講學數月,顧講得順暢自如,似乎完全克服了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給妻子張靜秋寫信,自謂成了該校授課的"大名角",上課的時候不但講堂裏黑壓壓的一大片,而且還有包括辛校長在內的蘭大老師和校外人士旁聽,因爲"蘭州人當我一尊神佛"。②

① 《顧頡剛日記》(二),頁469,529,701;(三),頁259。

② 《顧頡剛日記》(五),頁650—651;《顧頡剛書信集》(五),頁233—234,239,281。

口吃者時時刻刻爲自己的口吃而煩惱,因此心理上與不口吃者形成一些顯著的不同。已有的研究表明"口吃人羣中强迫、人際敏感性、焦慮三項項目的比例很高。"①顧頡剛雖然不喜歡口頭表達,但他對自己的書面文字,卻顯然十分看重,而且一再推敲修改,顯示出一種追求完美的强迫癥。他在寫作《古史辨・自序》的時候,日記中記有他邊寫邊改多次。多年之後,他又將這篇文字重新拿出來展讀。而他對別人文字功夫不好,則會十分敏感,批評相當嚴厲,包括對他的繼子顧德輝。② 顧頡剛與平輩關係難處好,顯示出他的人際敏感性,而他的焦慮和緊張,他的室友和同窗傅斯年十分了解。有次傅氏讀到一篇顧氏署名的文章,立即就覺得不是顧頡剛所作。顧問他爲什麽,傅的回答是"子所做無論文言白話皆緊張,而兹作不然,所以知之"。顧頡剛說"孟真目力之鋭自是可佩"。③ 這裏雖然說的是書寫的文字,但傅斯年對顧頡剛的焦慮情緒,的確有透徹的了解。另外,口吃的研究也表明,口吃者的偏執、壓抑、敵對情緒和恐怖的比例也相對比不口吃者高一些。這些都有助解釋顧頡剛與朋友關係難處的原因。

上面已經提到,弗洛伊德也許是最早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口吃者的。弗洛伊德之後的德國精神分析學家凱倫・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對青少年的心理形成及其特徵,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理論,並挑戰了弗洛伊德的許多觀點。霍妮雖然不專門研究口吃者的心理,但她的理論對口吃的研究者頗有影響。譬如美國學者多明尼克・巴巴拉(Dominick Barbara)就吸收和采用了霍妮的許多研究成果,對口吃者的心理作了詳盡的分析。巴巴拉本

① 姚鑫山《口吃的心理治療》,頁 11—12。
② 《顧頡剛日記》(四),頁 534,536;(六),頁 166。
③ 《顧頡剛日記》(三),頁 372。

人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口吃患者。他的研究指出,口吃者有一種特殊的心理情結,他稱之爲"德摩斯梯尼情結"(Demosthenes complex),用古希臘那位克服了口吃的著名演說家命名。他說如凱倫·霍妮發現的那樣,一般人在青少年時代,會出現一種"自我美化"(self-idealization)的現象,認爲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不用再聽從父母和長輩的指示和教誨了。這一"自我美化",會導致青少年期常出現的反叛行爲。但巴巴拉認爲,口吃者從"自我美化"又過渡到"自我神話"(self-glorification),也就是知道自己說話有障礙,但卻特別想在其他方面、特別是智力方面做到與衆不同、出類拔萃,因此格外努力、追求完美,希望自己能像德摩斯梯尼那樣,克服說話的障礙,成功逆襲,成爲受人尊敬的人物。

由於口吃者有比一般人更强的願望追求成功和榮光,因此巴巴拉認爲其心理又具有下列主要的特徵。一是他們渴求一種"復仇式的成就"(vindictive triumph),認爲自己雖有不足,但這是上天對他們的挑戰和考驗,自己如果格外努力則完全可以克服。因此他們對自身要求特別高,又特別努力,表現出自我中心和自戀自大的特徵。二是他們高度敏感、容易生氣和多疑,常常將周圍的人視作"假想敵"或假想的競爭者,於是特別反感任何形式的壓迫和强制,性格格外倔强和執拗。三是他們對自己的能力有不切實際的設想,認爲自己幾乎有魔力,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於是全身心投入,又特別仔細認真、一絲不苟,因此對旁人表面上客氣、友好,但心裏則要求甚高,常常不滿意他人的工作。其結果就是事必躬親,一直處於奔波勞累、疲憊不堪的狀態。①

多明尼克·巴巴拉所總結的這些口吃者的心理行爲,在顧頡

① Dominick Barbara, *Stuttering: A Psychodynamic Approach to Its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New York: The Julia Press, 1954), pp.80–139.

剛身上幾乎都能找到十分典型的表現。由於篇幅所限，下面只舉幾個主要的方面加以分析、論證，希望能就這些心理行爲幫助讀者理解顧頡剛之提倡“疑古史學”。第一，顧頡剛有比較明顯的自戀傾向。他在年輕的時候受制於口吃，無法順暢地口頭表達，又誤認爲自己記憶力差，因此思想交流更傾向於訴諸筆墨。他不但與老師胡適、錢玄同用通信的形式頻繁交流自己疑古的思想，也樂意與他的批評者劉掞藜、胡堇人等進行筆戰，將劉、胡的來信和文章在《古史辨》全文刊出。在胡堇人、劉掞藜分別於 1933 年、1934 年去世的時候，他還特別惋惜“悉劉楚賢君（掞藜）於本年陰曆七月初八日卒，年僅三十六，學未能成，可悲也。胡堇人君亦於前年死矣。十餘年間，遂零落至此！”[①]而顧頡剛花幾個月時間寫作《古史辨・自序》的長文，反覆修改，並在之後常常自己展讀和給別人（特別是他喜愛的譚惕吾和之後的妻子張靜秋）讀，或許是他自戀傾向最明顯的例子。[②]《古史辨・自序》中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從小到大的心理、智力發展過程，詳細解釋自己如何反覆思考得出古代史不可信的結論，又仔細說明自己的方法和取徑又如何與康有爲、章太炎和胡適等不同，而到了文末，他又向讀者細細交代了自己今後的學術規畫和努力方向。上述這些行爲，十分符合一個自戀者的心理特點。用“自戀”來形容顧頡剛性格的一個方面，似乎過於負面。雖然“自戀”這個字眼讓人覺得不太舒服，但其內涵還有對自己高度期許的一面。大多成功的人士，其實都對自己要求甚高、甚嚴。顧頡剛也不例外。

顧頡剛在日記中不厭其煩地記錄自己失眠、神經衰弱和便秘，其實也可以視爲他自戀、自我中心的一個重要表現。更廣義一點

① 《顧頡剛日記》（三），頁 398。

② 《顧頡剛日記》（一），頁 728—732；（五），頁 241。

說,他詳細地記錄自己的日常起居生活,並常常將自己的日記製成大事年表,都與他的自戀傾向有些關係。有人也許會說,爲什麽他願意讓後人知道這麽多他的隱私,似乎不可思議。但答案並不難理解,那就是他在生活中的確爲這些別人看來細小的瑣事所困擾,因此必須將之記錄下來,不吐不快。這一舉動反映的是自我中心、自我重要、壓倒一切的心理。江勇振在其胡適研究中,指出胡適在其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中,詳細地講述自己由於痔瘡而肛門膿腫、排便困難,然後肛門如何發膿、出血、破裂等現象。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解釋說,胡適具有一種肛門偏執狂,背後反映的是他寫作的焦慮,因爲"排便的行爲,可以被我們的下意識詮釋爲損失或盈利——亦即,生產以及創作"。江勇振進一步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說,胡適是"肛門型的人",具有"有條不紊、節儉、固執的性格特色"。① 胡適顯然並不口吃,江勇振這裏的分析只能作爲參考。但美國心理醫生彼得·格勞博爾(I. Peter Glauber)總結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學對口吃研究的貢獻,認爲口吃者具有自戀的心理特徵,也有肛門性虐(anal-sadistic)者的特點。② 顧頡剛對便秘十分在意,而一旦排便順暢就十分滿足,立即在日記中將之記錄下來,顯現出他似乎也具有這一心理特徵。

第二,顧頡剛有做事有條不紊的方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他的倔强固執、堅持己見,不願受到任何壓迫。上面已經提到他在中山大學工作的時候,感到傅斯年以家長作風壓他,他便寧願與這位友情甚厚的老同學翻臉。他在之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傅斯年作風

①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下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116—119;引語見頁118。

② I. Peter Glauber, "Freud's Contribution on Stuttering: Their Relation to Some Current Insigh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 2 (1958), pp.326-347.

霸道，認爲他驕橫必敗。① 其實他的敏感多疑，自小就有。他的《古史辨・自序》中提到初入小學的時候，對老師印象甚好，但不久就覺得不行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桀驁不馴的本性又忍不住要發展了，我漸漸對於教員不信任了。我覺得這些教員對於所教的功課並沒有心得，他們只會隨順了教科書的字句而敷衍。教科書的字句我既已看得懂，又何勞他們費力解釋！”到北大上學之後，他有機會旁聽章太炎的講學，起初也十分欽佩，“自願實心實願地做他的學徒，從他的言論中認識學問的偉大”。但幾年之後，他對“太炎先生的愛敬之心更低落了”，認爲他雖然“薄致用而重求是”，但同時又受制於古文家的傳統，所以認定章“只是一個從經師改裝的學者”！之後他的治學，又受到了康有爲、崔述和胡適的許多影響，但他對康氏和崔氏兩人也漸漸產生了懷疑，認爲他們都“糅雜了先入爲主的成見”。顧頡剛在 1919 年給妻子殷履安寫信，也强調“疑惑”的重要，指出一個人有了“疑惑”，纔會去思想和推測，然後通過“實驗”來檢測真相。此處的說法，顯然有胡適介紹杜威“實驗主義”的影子，但也顯示顧希望獨立思考，不盲從他人。從北大畢業之後，顧曾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但一段時間之後，他就這樣寫道“我是一個生性倔强的人，只能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的。”於是他就從商務印書館辭職回到了北大，寧願接受較低的薪資而在北大圖書館、國學門任助理，以享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時間。②

---

① 《顧頡剛日記》(二)，頁 281 記道“孟真盛氣相淩，我無所求於彼，將謂可用架子壓倒我耶！其爲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見其敗矣。書此待驗。”1973 年他又補記道“此預言並未驗，孟真縱橫捭闔，在舊社會中固可立於不敗之地者。到全國解放，他方逃出大陸，死在臺灣，此則真敗耳！”

② 《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 12—36，41—57。顧頡剛給殷履安的信見《顧頡剛書信集》(四)，頁 34。

顧頡剛的"疑古史學",與他的老師錢玄同、胡適關係甚大。他對這兩位老師執禮甚恭,似乎沒有表現出反叛的一面。錢玄同於1939年便與世長辭,顧氏得知後,認爲錢氏身體不好,"早料由此,未盡其才,太覺可惜耳"。兩個月之後,他又夢見了錢氏,"態度陽陽如平時,予不能忍,報而哭之,遂醒"。① 可見他對錢的提攜,頗懷感情。顧頡剛對胡適,雖然也一直恭敬有加,從不違師生之誼。但上面已經提到,顧頡剛與胡適有爭勝的心理,同時他也對胡適與他的關係,多有猜疑,特別是胡適在1929年表示他不再"疑古",而要"信古"之後。顧頡剛在晚年寫作《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這樣描述,他在聽了胡適要"信古"的話之後,"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爲什麽會突然改變的原因"。② 用余英時的話來形容兩人的關係:顧頡剛"'疑心生暗鬼'的心理也使他和胡適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顧在1931年給胡適寫信,沒有及時收到回信,便起了疑心,認爲別人在胡面前說了他的壞話。1949年4月胡適離開中國大陸之前,曾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顧頡剛記道"適之先生來滬兩月,對我曾無一親切之語,知見外矣。北大同學在彼面前破壞我者必多,宜有此結果也。"③顧頡剛與胡適的這層關係中,至少透露了顧心理的兩個方面,一是他的多疑和猜忌,二是相對胡適,顧的思想始終如一、疑古立場不曾改變,體現出他執拗、頑强的性格。

第三,顧頡剛不但執拗倔强,而且還自視甚高,認爲自己可以企及許多目標,因此他從學生時代開始,就喜歡制定計畫,希望能幫助自己獲得更大的成功,以致爲老同學傅斯年所譏笑。顧氏自

① 《顧頡剛日記》(四),頁191,207。
②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一),頁13。
③ 《顧頡剛日記》(二),頁560;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46—49。

己指出,他與傅斯年沒能繼續共事,就是因爲他們倆辦事的方法很不同。他"什麽東西都喜歡畫了表格來辦",而傅氏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無軌道"。他女兒顧潮卻認爲父親太過死板,而傅斯年辦事則有靈活性。① 《顧頡剛日記》中不斷出現他制定的研究、出版計畫,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無怪顧氏認爲自己將大器晚成了。但顧頡剛認爲自己晚成,並不表示他自視不高,其實正好相反: 他認爲自己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爲許多人所難以企及。他在1930年的日記中寫道"'諸妒予者皆以予得名太驟,孰知予致疾痛之多乎! 諸君如能有此'幹'的精神,何慮不如予也!"他心裏其實覺得,他人與他相比,做不到像他這樣的。1944年他在復旦大學任教,得知學生楊廷福(1920—1984)僅二十一歲,便寫出了《中國韻文史》,認爲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妻子張靜秋問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如何,顧拿出自己二十二歲時寫的《古今僞書考》,然後說"比較之下,予能作批評,能發問題,而楊君則平鋪直敍,一教科書耳,一點鬼簿耳。復看《古史辨》中諸文,皆予卅歲左右所作,才氣橫溢,一身是膽,今不如矣"。② 顧頡剛之自戀自大、爭强好勝的性格,在此展露無遺。他不但與別人攀比,而且還與從前的自己相比,充分表現出他的倔强好勝,用老當益壯的成語來形容,似乎都還遠遠不夠。

顧頡剛研究、出版計畫龐大,多次形容自己"好大喜功"和"貪多務得",因此日記中常記載他心力交瘁、疲憊沮喪。如他在三十出頭寫作《古史辨・自序》的時候就感嘆"'我現在忙得真苦!"③五

① 傅斯年曾對顧頡剛說"你老是規畫終身的大計,我決得定你一件也做不成的",但顧並不以爲然,一生中仍然不斷制定計畫。見劉起釪《顧頡剛先生學述》,頁339—340。另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28—129。

② 《顧頡剛日記》(二),頁382;(五),頁240。

③ 《顧頡剛日記》(二),頁396;《古史辨・自序》,《古史辨》(一),頁99。

十多歲的時候,顧的學術事業已做出許多成績,引起別人說他"好大喜功",而他則回應說是"生命力充足的表現,天下的大事業那一件不是由好大喜功的人擔當起來而獲致的成功。沒有秦皇、漢武的好大喜功,那有我們現在托庇的中國。沒有孫中山的好大喜功,那有現在的中華民國。我胸中有不少的大計畫,只苦於沒有錢,沒有勢,久久不能實現"。① 顧頡剛的確生命力充足,孜孜不倦、學無止境。爲了執行、開展他多樣龐大而又無窮無盡的計畫,顧努力培養後進、發現人才,顯示出他愛才的一面,而另一個原因就是自己一個人根本無法獨立操作,需要他人的説明。對於自己欣賞的人才,顧竭力提拔,不過如果他們做事沒有達到他的要求,還是會嚴厲批評(至少在日記中)。舉例而言,譚其驤是顧頡剛組辦禹貢學會時的得力助手,顧對譚頗爲欣賞並努力培養。不過他在日記中也指出,譚其驤不夠勤快,做事粗糙。1935 年他在日記中記道 "《禹貢》三卷一期寄到,錯字滿目,甚欲想一能任校對之人,而竟無之,不勝'才難'之嘆。季龍(譚其驤字)爲何如此不中用?"之後顧氏請了張佩蒼來幫他校對《禹貢》雜誌,"覺其心粗甚,決不能任此事,予只得自勞矣。噫,才難如此!"②上面已經說過,顧頡剛口拙,而對書面文字的要求特別高。他做事又十分精細,別人做事不達標準,就必然事必躬親,於是常常忙得焦頭爛額。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顧頡剛具有一個口吃者比較典型的心理、性格特徵,並在其爲人和治學上有明顯的表現。筆者著文指出、討論和分析這些方面,絕無不敬之意,相反,對顧頡剛這位鄉賢前輩,充滿了尊敬。本文寫作的目的是指出學者治學及其成就,除了受到時代氛圍、思想觀念的影響之外,更有個人的

① 《顧頡剛書信集》(五),頁 269。

② 《顧頡剛日記》(二),頁 571,718;(三),頁 318,404。

心理、性格乃至情感的因素在內。顧頡剛自小爲口吃所困,對他的一生都帶來了不便,但筆者希望通過本文指出,顧頡剛在學術上所獲得的巨大成功,除了現有的論著已經注意到的五四新文化、反封建運動的影響,又在一定程度上與他的幼年生活、家庭關係和個人經歷等形成的種種心理、性格特徵,形成一種有意思的聯繫,值得後人重視。本文希圖拋磚引玉,對此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但筆者並不認爲上述因素是顧頡剛獲取巨大學術成就的惟一成因。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其特點是用一些似乎負面的詞彙來形容一個人的心理特徵,如戀父、戀母情結等等,並有將所有的人都視爲精神病人的傾向。但貢獻在於讓人看到一個人行爲背後之潛在而深層的心理、精神和性格因素。以顧頡剛而言,他的多疑和猜忌,使他不人云亦云,力求獨立思考,而他的倔强執拗,則有助形成他的反叛性格,挑戰中國傳統的古史觀念,堅持不懈、不遺餘力。他的自戀自大,導致他全身心投入學術,有一種"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決心和決斷。① 而他的好大喜功,則讓他聚集人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學派,助其"疑古史學"成爲中國近現代史學中的一個意義深遠的流派。我們今天研究顧頡剛,不但要注重他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更應分析、懷念他的人格和學品,對他治學和爲人有一個更爲全面的認知。

附記:作者感謝荷蘭萊頓大學的赫爾曼・保羅(Herman Paul)教授邀請參加 2017 年 1 月 26—27 日在萊頓大學舉行的"The Persona of the Historian: Repertoires and Performances, 1800–2000"的國際會議,使他開始從心理、性格的角度考察顧頡剛的學品和人格。本文初稿完成以後,承蒙南開大學的余新忠、美國西肯

① 洪興祖《楚辭補注》卷一《離騷》,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4。

德基大學的杜春媚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李志毓撥冗閱讀,提出了有益的批評建議。2017 年 6—7 月間,筆者以此爲論題,在華東師大、山西大學和首都師大等處演講,在此也對師生們的提問,表示由衷的謝意。

(本文作者係美國羅文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北京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535-545), as is stated in his biography in *Xu Gaosengzhuan*. Examining the two trials and discussions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ṃgha hints the fact that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riminal monk shall be sentenced by the official government before his retrial according to the monastic codes. The judicial procedure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tradition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Tang period.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debate, Zhizang and Liang Wudi alluded the passages in the *Mahaparinirvana-mahasūtra*, in which the Buddha declares that his cousin Devadatta is not a evil monk, but a skill in means in preaching his doctrines. This way of interpretation is very popular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echo of which one can find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Liang Wudi and the northern envoy Li Yexing on the mean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Later historians fail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ical dialogu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refore blur the focus of this debate.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is the line between monastic codes and the secular legislation.

Why Did Gu Jiegang (1893-1980) Distrus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 New, Psych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Q. Edward Wang (p.253)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China experienced a notable transformation. After Liang Qichao called for a "Historiographical Revolution" in his *New Historiography* in 1902, Gu Jiegang during the early 1920s launched the Discussion on Ancient History, which became a revolutionary event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how the Chinese viewed their past. Drawing Gu's writings,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iscussion of Ancient History, there is a need for us to

examine Gu's pers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shaped by his childhood upbringing, family relations and early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he notes that being a stutterer, Gu manifested a distinct personality and psyche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riendship, his career as well as his interest and pursuit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suboi Kumami and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Li Xiaoqian(p.289)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it relies mainly com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existing study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史學研究法) written by the father of Japa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Tsuboi Kumami.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unpublished lecture notes and newspaper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Japanese original, this paper uses a lot of facts to show Tsuboi's Bookhas existed implicit communication in the circle of history in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irstly, Tsuboi's Book is the first model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ography; Secondly,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supporting disciplines of history, this is a way to achieve "scientific history", and many Chinese historians have done researches on its supporting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pursue its "scientific"; Thirdly, there are many classic case in Tsuboi's Book. As examples, it educates many scholars and becomes popular in the circle of history in China; Finally, the definition of history, the types of history, *A General*